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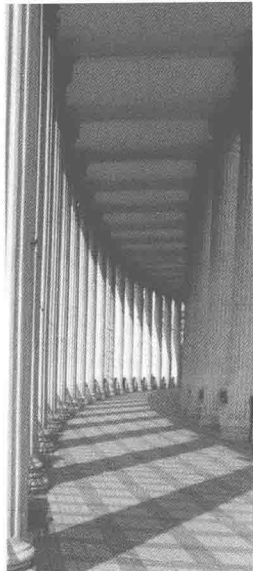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现代化进程中的 外国文学 (上册)

陆建德◎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化进程中的 外国文学

(上册)

陆建德◎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 / 陆建德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268 - 1

I. ①现… II. ①陆…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109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1701 千字
定 价 398.00 元 (全 2 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项目

序 言

本书的书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首先需要对其中的关键词“现代化”略作解释。

1981年，英国诗人斯蒂芬·斯班德与画家大卫·霍克尼访问中国，当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话语在全国都非常流行，相关的标语口号和宣传画处处可见。斯班德受邀来到一所大学，英文系的学生为“来自远方的客人”献上一台节目，以示“热烈欢迎”之意。斯班德在他的游记里特意提到，一位穿得漂亮的女生上台朗诵华兹华斯的小诗《致布谷鸟》，一位男生则用丰富的肢体语言“表演”了雪莱的《西风颂》，其神情就像中式建筑前面的石狮，看起来威严，却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为什么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作特别让亚洲人着迷，这是斯班德未能解答的。轮到他上台了，他念了自己一首小诗《词语》，大致说词语像一条滑溜溜的小鱼，我们想抓住它，它总是逃掉，^①甚至还在我们手上咬一口。斯班德接着建议那些好学的中国青年读读艾略特、叶芝和奥登的诗歌，大概这些现代派诗人不再简单相信词语和现实之间完全对应的关系。^②讨论现代化的进程，有时也感到“现代化”的概念就同斯班德诗里的那条小鱼一样，好像看得真切，却抓不到。不过它要比小鱼厉害多了，一旦被它咬了，伤口可不容易长好。

关于现代化的理论，19世纪下半叶就出现了，比如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就是其中之一。这方面的理论到了20世纪就更多，几乎到了“众声喧

①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讨论人的“同一性”（identity）时也说，“我从来抓不住我自己”。

② 斯蒂芬·斯班德、大卫·霍克尼：《中国日记》，伦敦，1982年，第178—180页。

哗”的地步。^①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来看看《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界说：

社会学中指从一个传统的乡村的农业社会转化成一个非宗教的城市工业社会。人类文明进程自史前时期起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原始社会和公社的出现。第二阶段原始社会联结起来，并转化为文明状态。第三阶段始于18世纪产业革命，持续至今，现代工业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普及。

这里的分期也许是有争议的，巧的是本书也从18世纪初期的文学作品开始。《不列颠百科全书》该词条撰写人接下来谈到第三阶段的思想特征：

现代思想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一向是一种反作用力，这种力量通过与先行于它的思想作比较或对照，又通过抵制或否定先行于它的思想而衍生出意义和动力。这一观点产生一个将现代化看做一个个体化、专门化和抽象化过程的总观点。第一，现代社会结构将个人作为基本单位，而不是如同农业社会那样将群体或群落作为基本单位。第二，现代机构在一个劳动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体系中担负着有限的、专门化的任务。第三，现代机构服从由科学方法和科学发现取得合法性的一般规则，而不是隶属于特定的群体或个人的权力或特权或受制于风俗习惯与传统。

本书中不少章节可以理解为对上面说到的“反作用力”的探讨。需要强调的是现代思想与先于它的思想并不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往往难以剥离。而且所谓的“个人化”完全不是绝对的，它受到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制约，一些自以为“个体化”程度很高的社会

^① 参见谢立中、孙卫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其实在社会学、经济学乃至政治学里种种关于发展的理论，都可以纳入这一范畴。

又呈现出明显的群体特征、共同体意识和国家归属感。^①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各种“现代机构”，即它们未必能超越风俗习惯，^② 超越国家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但是现代性的悖论也被词条撰写人注意到了：

从一开始，现代性便具有两副面孔。一副是能动的、有远见的、进步的、预示着空前的丰富、自由与满足。另一副同样清晰可见的面孔是冷酷无情，暴露出疏远、贫困、犯罪和污染等许多新问题。现代性的许多特征增强到超出某种水平便产生一种对抗性反应。^③

可以说，本书比较着重于这里所说的“对抗性反应”的研究。

在我国，“现代化”一词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就经常出现于报章，或许是在日文的影响下，“现代化”原来称作“近代化”。我国率先从事现代化研究的罗荣渠先生曾呼吁取消“近代化”这一提法，^④ 但是在国内史学界仍未得到有力的呼应，或许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发展毕竟有所差别。^⑤ 在英语世界就不一样了，比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组织九位著名学者撰写的《中国的现代化》，就把中国历史上两个分水岭年代——1840年和1949年——连接起来考察，论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在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整合和科技进步等方面的起步、彷徨、动摇、发展、挫折和再发展的艰难历程，给读者以很强的历史纵深感。^⑥

究竟何为现代化？《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国

①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的感恩节致辞上忘了说“上帝保佑美国”，很多人以为他故意为之，愤愤不平。

② 如美国的度量衡至今未用公制。

③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④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8页。

⑤ 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冯天瑜、陈锋主编）。

⑥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部著作其实是美国“接触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产物，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联合赞助，1974年底开始酝酿，1980年付梓。书中比较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日本、俄国和中国的部分对中国学者来说极有启发性。

家。其实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方或国家，在各有特点的发展过程中面临不同的问题和挑战，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可以说，“现代化”是一个流动不居的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或关于它的标准与时俱进，往日的“现代化”可能与今日的“现代化”格格不入。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对这一点感受尤深，个别作者有时几乎抱有比较悲观的情绪，这也不难理解。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口号，而当时我们把现代化与一国的钢铁产量相联系，整个社会为提高钢产量想尽一切办法，“土法炼钢”“小高炉”等“新生事物”仿佛在不断吹奏着“现代化”的凯歌，但是当时环境保护意识缺失，大量树木被砍伐，用作“小高炉”的燃料，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其结果是可悲的，关于这些疯狂行为的研究讨论却不够充分。中国 2014 年的粗钢产量高达 8.227 亿吨，为全球产量的 49.5%，可是却成了我们的负担。目前钢铁行业仍然处于高产量、高成本和低利润的状态，行业供大于求的态势将继续存在。为了完成单位 GDP 能耗下降 20% 的目标，2010 年以来，淘汰落后产能和减产限电的运动正在中国的高耗能行业蔓延，钢铁业首当其冲，一度使得钢铁供应量减少。尽管钢铁总量得到了一定控制，但是马上被下降的需求所抵消，库存积压依然严重。钢铁工业消耗大量能源，“节能减排”在我国却是相对新鲜的概念。“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万元 GDP 能耗下降百分之二十的约束性指标，但是该目标最终以微小距离（0.9%）未能完成，2011 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万元 GDP 能耗降低的目标依然难以完成。^①又如环保部从 2011 年 11 月开始制定 PM2.5 环境质量标准，2016 年开始实施（实际上如所周知，实施时间提前了），而我国在 2011 年执行的是非常宽松的 PM10 基本控制项目。PM2.5 指的是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它们污染生态环境，甚至可以进入肺部，危害人体健康。并不是说，现代化的标准是 PM10，而后现代的标准是 PM2.5。其实我们可以说，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从欧美各国的文学史来看，作家从来没有沾沾自喜地欢呼时代的进步，反之，他们不断推敲进步，质疑进步，像牛虻那样为社会的平衡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还应该交代的是发达国家

^① 见 2011 年 11 月 23 日《新京报》。

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将“现代化”作为举国奋斗前进的目标，各国只是忙于处理、应对具体的事务，现代化不期而至，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如英国致力于解决工业化带来的大量问题，法国则发生了革命。在中国，现代化的口号还略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近年来，讲得更多的是“建设和谐社会”和“奔小康”。

清末民初以来，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一直是我国知识分子极为关心的话题。有感于小说陶熔诱掖、熏浸刺提的力量，梁启超把小说提高到“群治”的层面来认识，他的同辈中有人甚至提出“无文学不足以立国”。蔡元培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说，中国的思想革命始于文学革命。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域外文学的引进又是新文学运动的先声，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莫不是翻译家。本书研究的是外国文学，但是考虑到翻译作品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发挥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特设一章专论林纾的贡献。

本书继承前贤的社会关怀，以欧美国家（主要是英、美、法、德、俄）18世纪至20世纪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着力于文学与社会的互动，探讨文学如何形成“舆论的气候”（怀特海语），并对价值观念的演变和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巨大作用。文学不仅反映世界，还积极参与改变世界，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现在看来，外国文学还可以为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理念提供借鉴。

前些年，我国媒体乃至整个社会青睐经济话题，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人们似乎忽略了文学，忽略了文学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作用。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英国一批杰出小说家时说，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曾指出，巴尔扎克的小说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法国社会史，从他小说中的经济细节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些细节要比当时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著作更深刻。正是这些无与伦比的出色描写改变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我们现在谈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还应该记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文学的巨大热情，他们的阅读经验是令人赞叹的。中国还没有一位莎士比亚专家能像马克思那样熟悉莎士比亚的戏剧。

我国外国文学界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着重介绍西方工人阶级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考虑得较多的是作品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最终战胜资产阶级，或作者是否指出一条肯定普遍适用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当时学界不可能取“现代化”的视角，也没有意识到“现代化”可以包含苏联的经验，也可以容纳截然不同于苏联经验的历史过程。

本书所指“现代化”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便于操作。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致起源于 18 世纪初，随着商业精神的兴起、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逐步转化和“民主”政治的确立，浩繁的文学作品在记载、反映复杂的社会变迁的同时还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 18 世纪的法国和 19 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先导。海涅的名言经常被人引用：教授安静的书斋可以孕育出翻天覆地的思想。

卢梭是不是法国革命的先驱可以不论，现在经济学界经常讨论的“经济人”概念倒确实是来自 18 世纪初一位荷兰旅英医生曼德维尔的诗作《蜜蜂的寓言》。作者提出一个令时人惊骇无比的观点：人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反而因此得益；也就是说，私人的恶德将使社会变为天堂。曼德维尔故作惊人之语，受到来自各方的猛烈批判。但是他的一些见解或多或少地反映在 18、19 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之中。本书首章就是对《蜜蜂的寓言》的讨论。有趣的是，就在英国就是否应该允许公开发表《蜜蜂的寓言》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小说出现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前途不可限量，个人观念的流行与小说的流行有着复杂的关系。而英国 18 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家如笛福和菲尔丁并不是书斋里的作家，他们深深卷入了现代化的进程，用文学和政论干预生活。由于英国率先在世界上实行工业化，本书中关于英国文学的论述多一些，这也是我国英语文学研究的队伍比较齐整所致。18 世纪英国社会的美德观，以及发财致富的“英雄”的演化，19 世纪英国中上阶层的公共精神和责任感，这些是以往不大为我们所关注的话题，然而它们或许是英国核心价值 and 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英国的强盛做出过不容忽视的贡献。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东亚系主任的 M. J. 列维擅长比较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以及社会变迁。他认为日本工业化进行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没有像中国那样毁坏社会中控制越轨行为的系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成员行为的方向。而且日本有一个群体，他们很容

易转变为计划制定者和行政管理者，亦即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实行者。^① 明治时期日本的“中国通”如宗方小太郎等人多年生活于中国，交游极广，他们曾经极其尖锐地指出晚清社会普遍的腐败，全民的腐败：“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这些问题在我国很难展开讨论，那么我们能从19世纪英国文学中得到一点启发吗？其实一个世纪之前两位杰出人物曾就中国的出路辩论过。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相见，他们谈到祖国的未来。严复主张深入持久的渐进，他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的回答很有意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② 梁启超访游欧洲时看到巍峨的教堂，不禁感叹：最初的建设者，无缘欣赏很多年以后竣工时的壮观，这并不影响他们为建筑打好基础。严复多年从事教育，他就是这样一位不求急效的建设者、实行家。

欧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不是同步的，各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无不带有自身的特点。不考虑本国自身特点或国情，或套用别国模式的现代化，往往要走不少歪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或规律并不存在。例如，俄罗斯的现代化伴随着文学界对本国文化的评价，这和中国比较像。本书第四编专谈19世纪俄罗斯文学，重点介绍、评论的是俄罗斯作家关于本土化与西化的争论。美国独立后在文化上还依赖欧洲，爱默生的出现使得美国现代化进程带有鲜明的美国意识形态的印记。各国的差别还可以举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更是曲折漫长。我们组织了关于印度的专门研究，或许可以与我国的经验相比较。印度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不尽相同，如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中国没有的，这个所谓的“世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至今仍摆脱不掉种姓意识的纠缠，但是两国又多相同之处。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例子。奈保尔在“印度三部曲”中向读者介绍了19世纪中期一位英国战地记者，以及由他所报道的英军镇压印度反英起义的经过。

新闻史上第一位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罗素因报道克里米亚战争闻名。1857年，隶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军人发动反英起义，罗素作为《泰

① 列维：《“中日现代化因素之比较”再探讨》，载《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1146页。

② 见严璩编《侯官严先生年谱》，载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0页。

晤士报》特派记者历尽艰辛赶到印度记述这次事件，他的《印度日记：1858—1859》于1860年在英国出版。罗素自述，他所做的无非就是描述事物外表在他的感官上所留的印象，也就是说，他力求客观报道，对历史事件不做深层次的分析。然而，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在书中读出不少深层次的内容：罗素旅行于一个已被他的同胞仔细探索过的世界。他在去印度的路上到过不少地方，在日记中他只是一笔带过，因为已有英国人作过详尽的介绍。罗素的省略反映了一个民族巨大的集体认知能力。奈保尔最感到惊讶的是罗素在印度——一个叛乱的国家——来来去去十分方便，安全无虞。罗素详细描写了英军1858年3月攻打勒克瑙的经过。攻城成功后著名的凯泽巴宫遭劫掠，奥德王国的无数赏心悦目的建筑被毁，这是印度文化史上的浩劫。但奇怪的是有一大群印度平民兴高采烈地跟随着向勒克瑙进发的英军，支援外国征服者去打败他们的兄弟。大多数随军平民是印度教徒，他们有的是替军队照料绵羊、山羊和火鸡的赶畜人，有的则是苦力，搬运各种各样的货品柜和箱子。每到一个营地，帐篷已经搭好，仆佣（主要是穆斯林）出来迎候。餐桌上食品丰富，啤酒、葡萄酒一应俱全，庞大的军仆阵营使征服者的生活在这非常时期依然十分舒适。罗素承认，“很难相信我们是在敌人的国度里”。从罗素的文字来判断，当时的印度人根本不理解这场战争的性质，人们仍在田间劳作，也有不少人想谋求英军中军仆的职位。围攻勒克瑙的军队主要由苏格兰高地人和锡克人组成。九年前（即1849年）英国人借印度兵之力打败锡克王国，现在锡克人在印度兵起义之时站到英国人一边。锡克兵为向印度兵报一箭之仇在整个勒克瑙战役中表现得极其凶残，他们一心雪恨，凭着本能在打印度的内战，对他们所效劳的帝国体制没有任何认识。读到这些记载，谴责英国人的狡猾或者把英军的胜利归功于金钱的力量是没有意义的。现代化也需要强大的国家意识和社会共同体的内聚力，19世纪的印度任殖民者摆布，也可以归咎于文化上的弱点。八国联军进入天津、北京的时候，不少中国民众的表现也令人浩叹。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在一个大框架下突出个案，在作品、作家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各章节撰写者的专业语种背景不同，但大家都重史料，重文本，尽量避免空洞的理论话语，在研究与现代化相关话题的同时又把学术研究推到新的高度。大致说来，本书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我们以往写文章时重视的是翻天覆地的革命，评价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往往要看它是否宣传无产阶级暴力革命。19世纪俄罗斯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曾说，你在一个筐子里边，要把筐子推翻是很难的，但是你走到筐子外边，就很容易把它推翻。这是一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态度，也许在俄罗斯有其合理性，不过也应该倾听今日俄罗斯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有些国家的作家更愿意用较为温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国家的种种弊端，如英国费边社的宗旨是在英国以渐进的方式推行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该社的名字来自古罗马将军费边·马克西姆斯（这位将军的战术其实也体现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之中）。英国工党登上政治舞台就是费边社不懈奋斗的结果。这种改良渐进的现代化观念也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本书还介绍了19世纪德国文学里关于人的和谐发展的理念以及康德、歌德、洪堡等德国思想家、文学家如何看待社会剧变的得失。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不断传来社会动荡和政治暴动的消息，英国却相对平安。欧陆激进派以为社会转型可以甚至应该通过极端手段毕其功于一役，英国人则是脚踏实地，不断地修修补补。他们是补锅匠式的改革家，而不是砸锅的革命者。英国工业史家诺拉斯的一段说明是非常有意义的：

现状的完全颠覆（bouleversement）不符英国人的性格。事实上没有英国字可以解释 bouleversement。英国对于先例是热心附从的，当需要变动时，除了“修补”，便不多作。但他们继续修补，直至锅子的补丁最后变成一个新锅子。虽然它的形式和大小会在修补的进程中完全变更，但它常常保存有最初的锅子形迹。法国是把锅子打破，并将碎片抛开而着手造一个完全不同材料的新锅子。其一般的结果，法国任何变迁是属于智识的，即预先想出的智识计划之果，法国人每每喜欢从最初的地方开始做事。英国的变动，虽然结局也或许是彻底的，但只是渐进地实验的结果；捉住具体的问题，且捉住由此而发生的新问题。这不仅是工场立法的历史，而且是英国十九世纪其他一切工业立法的历史。^①

^① 诺拉斯（L. C. A. Knowles）：《英国产业革命史论》，张格伟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0—151页。法文bouleversement的意思是“混乱、颠倒、动乱”等，其动词形式为bouleverser。

这段文字的最后两句尤其紧要。在 1850 年前后，英国的议会不断针对时弊及时立法，范围非常广泛，而整个国家机器又有强大的执法能力。这些行之有效的新法案又成了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极有价值的参照。英国政府还会临时成立专门委员会就某一社会问题组织调查，以求解决。阿诺德和特罗洛普等英国著名作家就曾经担任过这些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他们的创作是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的。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关键的一步。英国精英阶层深入社会基层制定与时俱进的法规，我们也可以参考相关的经验。当今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明年（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稳妥的渐进主义有其合适的一面，对此我们已经形成共识。难就难在执政能力和全民素质的提高。

第二，现代化是现当代中国人民奋斗追求的目标，它的种种现象在欧美国家出现时却往往是被批评的对象。五四运动的时候，新青年和他们的导师崇拜“德”“赛”两先生，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科学要比当时的“赛先生”现实、成熟得多，两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真正科学发达的国家，“科学”反而没有至尊的地位。这实际上牵涉到一个科学发明和经济发展最终为什么社会目标服务的问题。有些欧美国家的“语言生态”值得我们认真注意。卢梭对科学和文明的质疑，福楼拜对科学至上观的批判，英国小说家对“机械”和“进步”观念的嘲讽，无数作家对自然环境的关爱，所有这一切制约了某些趋势，形成一种思想观念的平衡，有利于现代化进程往较为温和、健康的方向发展。在这相对平衡的体系里，新与旧能够互相包容调适，融为一体。假如我们把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比为一艘帆船，那么，新旧调和的文学既是船上的风帆，也是舱底的压载。只图新，只有风帆，也许有速度，但很快会倾覆；只守旧，只有压载，就不会长风破浪。

第三，对文学、文化、教育的偏重。在有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语言与文学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色列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国家，两千多年以来犹太民族用它的宗教和文化维系了自己的民族认同，19 世纪中后

期开始，一些优秀的犹太裔人士又通过复兴希伯来语、创作新的希伯来文学来打造民族凝聚力。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族语言和文学也在现代化过程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近年来有好几位研究人员得到国外的国家级奖章，因为他们翻译了那些国家优秀的文学作品。每个国家都为自己的文学传统自豪，因为文学是一国核心价值最生动全面的体现，是民族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称之为民族或国家的灵魂，绝不为过。但是每个国家又有特殊的国情，对印度人来说，英语是殖民者的语言，可是英语却起到统一诸邦的作用，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甘地等人，都接受过英式教育，他们在投身政治活动的同时，又不断呼吁国人移风易俗。如果印度不从种姓制度的传统走出来，就没有现代化进程可言。介绍印度古代和现代文学的时候，这句话是不得不说的。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不免经常想到中国的情况。现代化进程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以往讨论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会说那套惩罚机制专门压迫穷人。假如换一个角度看这问题，也许我们会发现，英国执法部门能有效地对任何欠债人进行惩处，何尝不是国家权威和治理能力的体现！19世纪欧洲文学作品里常有执行遗嘱、托管财产、破产拍卖等场景，这些难道不是法治的形象体现吗？要说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建设和法治精神的培养，我们要走的路还十分漫长。

20世纪头十年的晚清政府就如一辆破旧的大车，经不起赶车人和后座上诸多催逼者的折腾，终于散了架。戊戌变法时鲁莽操切的“大跃进”又一次重演。改革的中枢失去了必不可少的领导之力，种种关于新政的条文沦落为纸上的狂想。地方势力纠集党徒，请愿国会，弹劾军机，成立宪友会和咨议局联合会，拒绝铁路收归国有，莫不呈现出藐视、胁迫中央的意图。时局至此，国家分崩离析，指日可待。清廷1901年推行新政的时候，“就建立一个具有征集资源和协调地方活动能力的中央集权政体来看，中国比日本、俄国何止落后40年！”^①这是美国学者的浩叹。可见当时的中国真正欠缺的是治理，所谓的“专制”只是虚名而已。清朝为民国所取代，地方政权落入比晚清政府更加自私的团体手里，这些自私集团无法驾驭家庭

①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435页。

和秘密会社的强大分裂势力。真正巨大的变化发生在1949年。“从18世纪末开始并在20世纪加剧起来的政府衰弱，应当说更多出自国内原因而非国外影响，恰恰是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点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过去真正决裂了。”^① 用我们的话来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与过去决裂的中国踏上康庄大道，然而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不是一成不变的。早在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同志说：“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奋斗，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② 改变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同志这一时期对国家建设目标的表达方式。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三个现代化：“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③ 这一提法已经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大致相同。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提法作了完善和补充。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④ 这里的“原来要求”，指的就是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一再谈及“四个现代化”，他尤其强调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

①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40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行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①

我们的目标达到了，也没有完全达到——因为我们的标准变化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道路就是以转轨为基本特色，即“把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以公正自由的市场竞争取代行政干预和特权垄断，同时保持和完善整个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实现比自由主义现代性更高更彻底的另类现代性”。^② 中国的体量太大了，转轨速度太快就非常危险，休克疗法就是一例，整个国家势必付出很多不必要的代价；速度太慢，也会丢失掉转瞬即逝的机会。如何平稳过渡，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考验。本书编撰者的态度是乐观的，相信小康社会必将在不远的未来出现在中华大地，“中国梦”必将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必在此一一罗列，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数亿人口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脱贫，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还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挑战。2011年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在广州召开，国家环境保护部一位总工程师透露，我国环境污染仍然严重，26%的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20%的水质为劣五类，还有约10%的耕地面积重金属超标。此外，环境污染事件威胁群众健康问题比较突出，全国每年平均有150起污染事故；2011年1月至8月，全国发生11起重金属污染事件，其中9起为血铅事件。^③ 矿难和重大交通事故接二连三，食品安全问题一再曝光，所有这一切都凸显了社会治理的难度。2015年12月，北京市政府两次因空气严重污染发出红色预警。

①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83页。

② 曹天予：《中国道路的理论 and 实践》“代跋”，见曹天予主编《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01页。

③ 详见2011年11月7日《广州日报》。